

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大教学考

吴 艳

提 要 “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合大学教学考”有三层含义：一是实地考察——对西南联合大学原址的实地考察，发现文字材料所疏忽的内容和“坚硬的学规章程”实施环境的特点；二是文献考据——包括“坚硬的学规章程”和亲历者的怀旧想象、后来者的文学想像、研究者的历史想象，佐以其他传记材料。避免拔高、矮化或者曲解一多先生。三是问题考量：一多先生在哪些方面提升了教授、教学的境界？被提升的内容在当时的意义，在今天的价值。

关键词 实地考察 文献考据 问题考量

近年来，国内对“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体上说，一是对西南联合大学坚硬的学规章程的复原；二是对西南联合大学的相关想象：有亲历者的怀旧想象、有后来者的文学想像以及研究者的历史想象。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坚硬的学规章程”部分，花了极大功夫编辑成册以后，作为史料的存在她似乎完成了既定的使命，各类想象者、研究者不大理会前一类的史料，尤其是相关的学规章程。也就是说，对西南联合大学的研究本应兼顾“坚硬的学规章程”和相关想象这两个方面，这样我们的“还原现场”就既具备坚实的基础，也富有现实的生动性和复杂性。但目前这样的论文或者专著还不多见。本文期望以闻一多先生为例，将对西南联合大学“坚硬的学规章程”之类的文献考据与一多先生鲜活的教学现场还原结合。追问：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一个教授要完成的硬性工作有多少？体制内外的情况又如何？在西南联大的体制下闻先生应该做好哪些事情？包括教学、科研和其他行政工作；闻先生又做得如何？

—

“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合大学教学考”的第一层含义是：实地考察——西南联合大学原址的实地考察，以体验氛围，发现文字材料所疏忽的内容和“坚硬的学规章程”的实施环境。

当年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什么样的呢？所幸有结集出版的老照片，还有现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内保留部分原貌的“西南联合大学原址”。

2008年的8月，我到云南师范大学实地考察了“西南联合大学原址”，实地考察后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铁皮屋顶的教室”、西仓坡、先生坡、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学生运动”四烈士墓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普通的“铁皮屋顶的教室”现在只保留了一间，是平房。其实，当年的西南联合大学

的图书馆、实验室都是这样的铁皮屋顶的房子。学生寝室也是这样的,这是战争时期临时修建大学的“标准件”。在这样简易的学校里,师生如何教学?

当时的情景是:白天有“跑警报”,晚间灯火不通明,寝室无桌椅,图书馆自习室座位不够。用今天的话说,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学硬件非常地不硬。可它有“坚硬的学规章程”和坚定的精神担当!比如跑警报:1939年4月11日的国力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106次会议就决定“在办公及上课时间内如遇有空袭警报,得酌情停止工作和授课,俟解除警报后半小时内须一律恢复常态。〈公布、通知〉”^①珍惜生命是第一的,所以有“跑警报”,“俟解除警报后半小时内须一律恢复常态”则是生命精神或者说文化的、本职工作的、学业的继续担当。

晚间灯火不通明是说偌大一间铁皮屋顶的教室或者图书馆的阅览室,一般只配有两盏柴油灯,一前一后地挂在木柱上,那光随着火苗的窜动而晃动不稳。

寝室无桌椅,图书馆自习室座位不够,如何解决?据汪曾祺回忆,那时的很多同学是在联大周围的茶馆里聊谈自习。西南联大的学生,在茶馆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

泡茶馆对联大学生有些什么影响?汪曾祺说

“第一,可以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联大同学上茶馆很少不挟着一本乃至几本书的。不少人的论文、读书报告,都是在茶馆写的。……第三,泡茶馆可以接触社会。”

这其中的“可以养其浩然之气”至关重要。本来,

联大的学生自然也是贤愚不等,但多数是比较正派的。那是一个污浊而混乱的时代,学生生活又穷困得近乎潦倒,但是很多人却能自许清高,鄙视庸俗,并能保持绿意葱茏的幽默感,用来对付恶浊和穷困,并不颓丧灰心,这跟泡茶馆是有些关系的。^②

难怪时至今日《读书》还刊登了黄永厚先生的一幅画,题跋是:“鬼子来了都不怕,西南联大还为诺贝尔奖预备了领奖人呢。”^③这是铁皮屋教室的象征意味和引起我们骄傲的联想,是具体的小环境和实物。

西仓坡与先生坡:

昆明市钱局街西仓坡,是闻一多先生殉难处。当年,梅贻琦、冯友兰住过西仓坡5号,闻一多先生则住在6号。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被害圆通街,7月15日,

闻先生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悼念李公朴大会上作了“最后的讲演”之后,又前往府甬道《民主周刊》社,向新闻记者和各界揭露李公朴被害的事实真相。下午4时许,闻先生和儿子闻立鹤相伴回家,就在离家十来步之处,闻先生遇难。

在明清两代就小有名气的先生坡,因其与当时的贡院很近,所以是省内各地、州、县考生集聚的地方。先生坡内有驿馆。到了先生坡你自然会联想到西南联大的选址,地缘

^①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② 汪曾祺:《泡茶馆》,《滇池》,1984年第9期。

^③ 《读书》,2009年第12期封3。

上的客观效果是承接了传统文脉的。

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和 12.1 烈士墓。

闻先生的衣冠冢在四学生墓的前中央。这两处遗址让人浮想联翩。西南联合大学上接古代文人的文脉与传统;下传师生共同的精神文化担当,让人折服。这种对精神文化的担当使命,在西南联合大学组建之初就已经非常突出。以参加“徒步旅行团”从“临大”到昆明的壮举为例。1938 年 1 月 27 日,临大常务委员会第 47 次会议决议:

规定学生步行沿途作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①

1938 年 2 月 4 日临大常务委员会第 48 次会议决议:又对“徒步旅行团”的人数、路线、行程、各系负责人、经费预算等等作出安排。

闻一多先生是这个“徒步旅行团”的教授代表之一。2 月 19 日,“临大”迁滇,闻先生加入学生的步行团体,4 月 28 日才到达昆明,旅行 3500 华里。“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是西南联大对所有“徒步旅行团”成员的要求。闻先生一方面做田野调查、收集民歌民谣;一方面给予学生文化与精神的勇气。与底层民众零距离的接触,改变了闻先生对民间文学的看法。闻先生本来“是一个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同时又受西方文化熏陶的现代文人”,并具备“绅士风度”。^②对民间文学比较隔膜,在“旅行团”徒步过程中由收集民歌民谣、到后来研究民歌民谣,并取得相关成果。当然,这已经是文献考据了。

考察原址,可以睹物思人,那些实物是西南联大精神的载体;走近原址,还可以体会当年学章规程实施的可见环境。可贵实物或者原址的价值,是文字材料所不能替代的。所以,在 1946 年 5 月 4 日,联大师生在新校舍图书馆举行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石碑碑文为冯友兰撰写,碑文阴刻分别请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书丹篆额、中文系主任罗庸楷书碑文,共 19 行、1178 字。石碑的背面是由联大校志委员会编纂、并请中文系教授唐兰写篆额、数学系教授刘晋年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上列 834 名从军学生名单……

二

“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合大学教学考”的第二层含义是:文献考据——在西南联合大学体制内一个教授要完成的工作有哪些?相关制度如何?一多先生做得如何?这些关涉到对坚硬的学章规程的文献考据和鲜活的教学过程的复原。

西南联大体制对教授工作的要求大致包括 8 个方面:从受聘条件到工作量、兼课条款、学术休假、科研、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带硕士研究生和他行政工作。

关于受聘条件,由聘任委员会制定的西南联合大学《本校教师资格标准》对教授的要求如下:“具有下列三项资格之一”者即可聘为教授。

甲、三年研究院工作或具有博士学位及有在大学授课二年或在研究机关研究二年,执行专门职业二年之经验及于所任学科有重要学术贡献者。

^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 38 页。

^② 朱寿同:《论闻一多的绅士风度》,陆耀东等主编:《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4 页。

乙、于所任学科有创作或发明者。

丙、曾任大学或同等学校教授或讲师、或在研究机关研究或执行专门职业共六年,具有特殊成绩者。”^①

按理,这是坚硬的受聘条件,但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这三条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样它就可以不拘一格选人才。于是以1946年为例,文学院教授“学历与经历”有这样填写的:

冯友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秘书长等职。

罗庸:国立北京大学学士,北京大学教授。

朱自清:国立北京大学文学士,清华大学教授。

闻一多:清华大学教授。

游国恩:国立北京大学文学士。

陈寅恪: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究,清华大学教授。^②

关于学术休假:西南联大规定,凡在本校连续服务8年者可带薪休假一年,休假前需要报本人的研究计划,研究内容自定。休假结束后则需呈报研究计划的实施结果或成果。以闻先生为例。1939年,闻先生休年假,以准备新课“中国上古文学史”,^③1940年,闻一多先生致信校长梅贻琦先生,附上“中国上古文学史研究报告”。^④

●研究旨趣

(一)了解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为文学史之最基本,最直接的材料。

(二)考察时代背景。文学史为整个文学史中之一环,故研究某时期之文学史,同时必需顾及此期中其他诸文化部门之种种现象……

●研究工作。基于上述二项旨趣,本研究工作可分为下列二项:

(一)专书研究;

(二)专题研究。

●研究结果。(引者略)

有关科研工作:西南联合大学对教授的科研工作没有硬性的指标,只是在学术休假时需要个人申报较为详细的研究计划,休假结束时向校委呈交“研究报告”。平日是按个人兴趣和相关条件进行科学研究,也有为战时亟需的科研任务,这多半是理工科的教员。科研经费有具体下拨经费数额,有集中使用的大笔费用,有按职称分发给相关人员的。如,1946年1—6月,西南联合大学部聘教授薪俸为3600元(月薪600元,1945年校长月薪是710元),学术研究费为6000元。一个部聘教授每月的学术研究费是每月薪俸的1.67倍。^①重视研究过程,奖励终端成果,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科研工作的一个特点。教育部在194年—1946年共进行6届学术奖励,其中西南联合大学教师居多。

闻一多先生是部聘教授,1943年曾以《楚辞校补》获教育部第三届学术奖励的“古代经籍研究类”二等奖(当年此类一等奖空缺)。当年,同获教育部第三届学术奖励的西南

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390页。

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第228页。

③ 《闻一多全集·书信》,《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446页。

联合大学文学院的教授还有朱光潜的《诗论》,为文学类二等奖(当年此类一等奖空缺)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哲学类一等奖,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社会科学类一等奖,郑天挺《发羌之地与对音等论文三篇》社会科学类三等奖。^②

有关教学工作量又如何?西南联大要求教授工作量最低标准为每周8—12节。

根据可查找的材料统计,闻一多先生本科生教学的工作量,1942—1943年度课时为每周12节,1944—1945年度课时为每周13节,1945—1946年度课时为每周12节。所开课程12门,包括《诗经》《楚辞》《尔雅》《古代神话》《历代诗选》《周易》《乐府诗》《庄子》《中国文史问题研究》《国文壹C(读本)》《国文壹D(读本)》《国文壹E(读本)》。1940年,因为日本飞机轰炸,没有要求本科学子写毕业论文。1941年—1945年,闻先生共指导本科论文12篇。当时的中文系曾向校委报告,因为合并与战事影响,中文系教师的平均工作量不可能达到学校要求,为了今后的三校复原,也不能裁剪教员编制。在这样的情况下,闻先生仍然超过了平均量,这还不包括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和指导硕士研究生的工作量。

带硕士研究生:据写于1946年的《国立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概况》介绍,自1941年以来,闻一多先生任国立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主任,在文学(还有朱自清、浦江清)语言文字(还有王力、陈梦家)、古书校订(还有许维遹)三个方面指导研究生。^①

有关兼课条款:西南联大对相关方面作出规定:需要到校外兼课者,则要求授课地点在昆明市内;课时最多4节,且为本校所授科目;兼课之前需要报所在系、院、学校批准,兼课酬金经由本校发放……^②

其他行政工作:西南联合大学实行教授治学与治校。各系有教授委员会,处理教学以及行政事务。学校则有教授委员会和相关委员会。学校最高行政机构是校常务委员会,由原三校校长组成。西南联合大学9年时间,原三校校长即后来的校常务委员会委员基本没有变化,其他行政职位的变化比较大。文献资料显示其变化有几个特点:一、所有已定职位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因公或因私而空缺;二、任期内因公或因私不能任职者可向校常务委员会委员递交书面辞呈,获准后即可离任;三、因公或因私暂时离校几天或更长时间者,则离校前选好代理者,并呈报校常务委员会委员会批准。四、教授所任职位(出校委外)不另外发放补贴。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曾代中文系主任。1941年5月19日,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因公离校,闻先生代主任。1944年8月1日,罗常培又因公离开昆明一个月,仍然是闻先生代主任。^③ 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除了代理过系主任,还在1938年任“蒙自文法两院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委员”;^④1944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第七届校务会议教授代表。^⑤ 校外其他职务从略。

以西南联大体制对教授工作的要求的为背景,以闻一多先生为个案,从8个方面考察

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教学、科研卷》,第568—569页。

②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511页。

③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45页。

④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览卷》,第169页。

⑤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总览卷》,第109页。

了一个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方方面面,我们大体可以体会到西南联大体制的长处和教授群体的风貌,闻一多先是生当年西南联大教授群体恪尽职守的杰出代表,同时又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三

“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合大学教学考”的第三层含义是问题考量:先生在哪些方面提升了教授、教学的境界?被提升的内容在当时的意义,在今天的价值。

闻一多先生如何讲课呢?

例一,冯夷先生回忆闻一多讲《楚辞》的情形:先生讲《楚辞》的时间是在初夏的黄昏,七点钟。先生自己点着了烟,还问学生“抽不抽?”,一会而吟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然后开讲。据刘烜先生的《闻一多评传》记载,一多先生讲《楚辞》,开始报选修的只有2人,后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了。

例二,汪曾祺先生是作家,他曾经用生花之笔描写了先生讲课的特点。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也讲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河岳英灵集》,但是讲得最多,也讲得最好的,是晚唐。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 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①

例三,据王瑶回忆,闻先生给研究生讲“中国古代神话”,要求学生选定一个古代神话故事的题目,从类书中先把材料摘录出来,再复查原书,将材料按时代先后排序,分析其繁简情况及有无矛盾现象,然后考察它的来源和流变过程,写出报告。^②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且开始上课,闻先生讲授“尔雅”、“楚辞”。

1940年,开新课“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一)即上古文学史”;

1942年,开新课“周易”、“中国文学史问题研究”;

1943年,开始“新诗选”,与英国友人合作预备出版“中国新诗选译”,并且在“唐诗”班上讲田间的诗……

1944年,开新课“庄子”,同时也讲“尔雅”、“楚辞”。

1945年,暑假过后,先生讲课的内容是“诗经”和“乐府诗”。

1946年,放暑假没几天,7月15日,先生遇难……

其实,先生也曾经记载战争刚爆发时,教授们没有心思,难于坚守本职的困境。“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事,看书也没有心

^① 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南方周末》,1997年5月30日。

^② 刘烜选编:《闻一多教育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事,拔草也没有心事……”^①后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下到湖南的长沙组建“国立临时大学”。到了长沙,教授们开始还抱着一个幻想,“等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参加工作,或在后方从事战时的生产,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众教育上尽点力。事实证明这个幻想终于只是幻想,于是我们的心理渐渐回到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我们依然得准备教书,教我们过去所教的书了。”“半辈子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暂时的扰乱,只能使它表面上起点变化,机会一来,它还是要恢复常态的。”^②教授的常态是看得见的教学、科研工作,还有这些工作所赋予的文化精神!西南联大的学规章制度规范了从教者要尽职尽责;同时为他们的学术发展留有实在而广阔的空间。

闻一多先生恪尽职守,达到了西南联大对教授的要求,并提升了教授、教学的境界——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有创意的知识渊博的好教师。

回到我们的问题“坚硬的学规章制度”方面。谈到制度,借用美国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理论来阐发我们对西南联大问题的考量。诺斯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二是非正式规则,三是实施机制。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的等级结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和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制度安排中的关键一环。这三部分构成完整的制度内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可以这么说,西南联大体制对教授工作的要求的8个方面:其中的受聘条件、工作量、兼课条款、学术休假是正式规则,其坚实的行政执行基础则是较合理有力的实施机制,而教授们共同体现出的却是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文化的精粹以及对文化的自觉担当。

对西南联合大学原址的实地考察,我们可以触摸到“坚硬的学规章制度”的具体实施环境;通过文献考据,我们可以还原教学过程和现场;这样从闻一多先生而及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由制度层面到执行制度的层面和非正式规则层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化层面。闻一多先生是教授的典范,但一多先生只能够产生在他那个年代,他那样的大学。对“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合大学教学考”意义就在于此,它从正面警醒我们,今天的大学与西南联大的差距在哪里,差距有多大!今天的教授与闻一多先生的差距在哪里,差距有多大!知道了这些,要缩小差距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就不困难。毫无疑问,“坚硬的学规章制度”、坚实的执行基础和坚定的文化担当最为关键,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作者通讯地址:吴艳 武汉 江汉大学文学院 430056)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闻一多全集·书信》,第283页。

② 《闻一多全集·书信》,第497页。